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家庭微观社会学

让·凯勒阿尔
〔法〕P.-Y. 特鲁多 著
E. 拉泽加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家庭微观社会学

让·凯勒阿尔

[法] P.-Y. 特鲁多 著

E. 拉泽加

顾西兰 译

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庭微观社会学/(法)凯勒阿尔等著;顾西兰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538-9

I. 家… II. ①凯… ②顾… III. 家庭社会学 IV.
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9267 号

我知道什么?

家庭微观社会学

让·凯勒阿尔

[法] P.-Y. 特鲁多 著

E. 拉泽加

顾西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538-9/C·22

1998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9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4 5/8

定价:7.50 元

0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工业社会中家庭与配偶关系	4
一、一个经典的观点:伴侣关系	6
二、辩证的伴侣关系	11
三、哪种自主化	18
四、多样的相互作用类型	24
五、社会分层现象和相互作用类型	32
第二章 日常生活和配偶角色	36
一、多义的角色概念	36
二、一个经典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	38
三、资源理论	41
四、妇女从事职业劳动的影响	47
五、社会隶属和角色偏好	50
第三章 权力、协商和冲突	57

一、复杂的家庭权力概念	58
二、权力和协商	67
三、交换和互惠形式	77
第四章 子女的位置	82
一、现代化、家庭和繁殖力	82
二、社会地位和子女的地位	84
三、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91
第五章 适应及其措施	102
一、模糊的适应措施	103
二、协调过程的概念尺度	106
三、几个暂时结果	110
注释	117
参考书目	136

引 言

对家庭的形式和功能分析,就数量而言,是社会学中最发达的领域。像此书这样简短的作品不能把方方面面都介绍到,在这儿,我们偏重于有关家庭内相互作用的社会学,而不是有关家庭机构的社会学。

选择家庭内相互作用这个主题不牵涉任何认识论上的偏好,这仅仅映证了人们对把重点放在社会学专著中一个研究得非常多的领域有所担心,这也符合某些作者的信念:这个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社会 and 理论现实性。然而,与把家庭现象与社会背景隔离开的心理学不同的是,我们主要努力弄清家庭内部关系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如何演进。

与其阐述什么是家庭关系,我们更想阐述一些社会学家分析家庭关系的方式。因此,我们的计划基本上是理论性的:使读者熟悉主要的手段——概念,类型,过程,社会学家用它们来阐述工业社会中

的家庭关系；同时，给读者指出理论在临时性和可完善性方面的局限和缺陷。

至于叙述的顺序，我们想根据规定的思想流派来排列：功能主义，象征性的相互作用主义，交换理论，马克思主义等。但是，除了在这些流派的划分上无法达成共识外，人们还注意到，经验论的研究只任意变换一些界限。几个“经典派”作者想超越这些内部纠纷，我们更喜欢分论题来阐述，选择那些看来在家庭功能中最核心的论题，它们还相应地在现代研究中占优先地位。在对工业社会和家庭类型的有关论点的全面分析后，我们将依次阐述一些特别的论题：角色，权力和协商过程，以及和孩子的关系，最后以对适应性的分析而结束。上面所提及的学派和论题的划分并不说明这些作者就没有疏漏及不足之处，也不说明他们就没有随意的偏好。幸好，在此领域，读者可以备有一些书目录，精解或教程，以及杂志，它们可以补充这部作品*。

或许该以社会学家对家庭下的定义来结束引言，但确切地说，重新阐述这个社会学问题，就是因为人们不太知道如何给家庭下定义。克服这个困难

* 这一点我们将参考作品末尾的书目，尤其是 A. 米歇尔和 M. 塞加兰编写的教程，还有 F. 德辛格利编的合集。

倒不是一种冒险行为,它可以成为某种智力开发的动力。

这本书写于 1983 年,对于其第二版,我们没能改写某些原本应该修正的部分,也没能够提出新观点。为了表示对新版的重视,我们只局限于对书目的改写,并作了一些简要的补充。

第一章 工业社会中家庭与 配偶关系

工业社会中,家庭的地位如何?尤其是,配偶关系是如何变化的?这一章将分析某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今天,我们知道,核心家庭(其定义是:社会上承认的夫妻与孩子的聚居和合作^[1])不仅仅是工业社会所特有的现象^[2]。尤其是在 P. 拉维斯的研究影响下,我们也逐步认识到,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大家庭占不到多数^[3],同时还意识到,就数量而言,代际间接触较密切的观点在许多人看来,还是无稽之谈。

因此,核心化的结构程序并不是分析工业社会和家庭二者间关系的理想出发点,从功能分析出发更有益处:家庭对其成员起何作用?它是如何为现代社会的文化一体化作出贡献的?

从 19 世纪开始,一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起点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概念和假设。而这些

正是当代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内容。这儿用不着列举有关家庭的“观点史”^[4]，我们可以提及三个循环论题，它们也是现代家庭中三个敏感的问题：

托克维尔坚持“民主社会”中家庭个人主义思想。他提出了家庭对自身的情感反省，以及规范反省，核心家庭对老一代不忠顺，对未来一代缺少长远的眼光^[5]。就这样，他首先提出了自主化观点，在此之中，自由和孤独情感相互关联。

斯宾塞发展了逐渐建立情感婚姻（因感情好而结合）的观点，反对因唯一法规原则而结成的联姻（因法律而结合）。我们将从杜尔克姆那儿发现一个与之相近的观点，他坚持个人的家庭连带关系（对父母任一方的依恋），反对因家庭财产积累而产生的凝聚力^[6]。

在摩尔根的研究基础之上，恩格斯试图给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和贵族婚姻之间的关系下定义。他超越了直线进化论这种过时又极端的观点，开创了一个思考研究的路线，主要用来分析在夫妻生活中，男女各自的财产对感情和权力二者间关系的影响^[7]。

这些社会学分析的尝试夹杂着围绕家庭正统观念而进行的思想斗争：传统主义者（德博纳尔，勒普莱）坚持家族根源观点，然而，社会主义者宣扬情感

和自由主权,就是以这场思想运动为出发点,才建立了家庭和工业化之间关系的现代理论。

我们将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两个社会学“经典”观点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伯杰斯,洛克和托姆斯及他们的题为“家庭:从制度到伴侣”的书,还有古德的题为“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的著作。

一 一个经典的观点:伴侣关系

为了分析现代家庭,从1945年起,伯杰斯等人提出了一种既典型又理想的区分提定婚姻和伴侣婚姻的方式。这两种形式中的前者有以下几个特点:婚姻由父母安排,经济目的(遗产转让,工作分工)占主体并作为合法结合的原则和功能独裁准则,家庭屈从于外界强加于它的行为规范。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伴侣关系的婚姻(也称民主家庭)把夫妇和孩子对个人发展的追求放在首要位置,婚姻建立在双方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并且具有作为(配偶之间甚至配偶和孩子之间的)功能的民主。

从指定婚姻向伴侣婚姻的变化,是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经济过渡;同时随着新型经济的出现,产生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浪潮^[8]。

1963年,古德在调查工业化对世界不同地区家

庭的冲击的同时,精确地分析并推广了这种变化方式。据他看来,它有以下特点或规律:

1. 亲属对核心家庭的行为失去控制,正说明了工薪阶层不断普及这一现象: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变得很模糊,自主化扩大了。

2. 父母对子女的(配偶选择)婚姻选择的控制减弱了。

3. 聘礼——婚姻前景的调节者,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4. 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生产向企业型的转移引起了家庭内情感份量变重。作为行为合法性原则的相互吸引力变得不可缺少了。

5. 在这方面,家庭适应性好像受夫妇关系的限制,而不是受配偶双方在婆家或岳家(从血统体系向婚姻契约过渡)的容纳程度。

6. 相应地,配偶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不稳固的,离婚率一直很高,而不像非工业社会中,离婚率忽高忽低^[9]。

古德理由充足地指出,这种夫妻家庭是一种既理想又典型的家庭,从数量上讲,这种家庭在工业社会中占主体地位;同时对家庭成员而言,这种家庭是一种行为规范。

在伴侣关系基础上,这种家庭在什么范围内适

应了工业体系呢？古德的观点和帕森斯的很吻合^[10]：

1. 亲属关系变得很不重要，这就能使劳动力进行流动，以便适应劳动市场的变化。这种关系使企业只考虑（在招聘中，工作条件等）生产者本身：大家庭体制，以及功过归结与本位主义标准是不适应现代企业的高要求的。

2. 职业角色以竞争、完成任务和疏远感情为基础，与之相比，家庭是情感稳定必备的保障。它能使个人，特别是社会职业底层的人，弥补由于工业体制而产生的紧张情绪、失望及人情淡漠。从这种意义来说，家庭情感是对经济劳动必不可少的补充。严格地说，没有任何约束的劳动力要比受夫妇生活牵连较多的男子起的作用大。然而，根据古德和帕森斯的观点，这样的劳动者很容易疲乏。总之，家庭能使个人保持并释放更多的劳动能量。

3. 通过孩子社会化的渠道，家庭能确保价值的再生产，而经济就建立在此价值基础上。

我们本来试图把指定婚姻向伴侣婚姻的过渡等同于家庭物质（劳动）作用的消失。几位作者通过以下几点原因来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1. 如果经济生产曾被转移为企业生产，那么，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家庭转换活动每天要占去好

几小时^[11]。某些商品可以代替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就像叙莱罗指出的那样,这一现象确实对经济生产的地位和威望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对人们所执行的权力也有重大的作用。但它不能消除任何东西,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家庭内进行的。人们很难想象劳动力和再生产已完全过时了^[12]。

2. 国家和企业渐渐地担负起了数量不断增多的社会化活动(学校,职业培训等),但这一切和别的任何现象都不吻合,相反,却与家庭社会化作用的减弱相吻合。实际上,在西方家庭史上,围绕着孩子的初级教育任务,家庭往返回复,具有上升趋势。阿里耶斯,弗朗德兰等人都指出:在现代社会初期,随着人们赋予孩子的童年期情感和(对看管,专用空间和自己的时间)需要渐渐显示出来,由亲朋好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抚养的孩子是如何渐渐地归属于这个(在辩证运动中逐步衰退的)圈子^[13]。

从这方面讲,谈论不断增长的不不管是初始的还是专门的社会化任务是比较正确的,而不是谈论从家庭社会化到国家社会化的转变。当然,这并不妨碍家庭在教育实践中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家庭之外的知识(心理普及),这也不妨碍社会化的各种途径(新闻媒介,家庭,夫妻)从十分矛盾的人道主义中得到启发^[14]。

3. 工业化国家内社会安全的各种形式得到大力发展。当家庭功能发生长期的重大的变化时,这一切显得极为重要。但它不能取代一切,因为在日常互助中,家庭网络很重要。针对法国,A. 比特罗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还强调,在条件差的经济领域中,这些(不仅是功能性的,还是象征性的)网络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15]。在美洲,萨斯曼和伯奇纳尔很久以前就强调了家庭中代际之间互助形式的重要性。最近,在G. 李提出的有关核心家庭和社会网络间关系的总体观点中,他明确指出,夫妻日常生活好像主要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亲戚关系的介入比较重要^[16]。由于环境不同,评估也就不同,互助形式很难用数字表达出来。李指出,在工人阶级中,互助表现为服务,在中层资产阶级中表现为财产转移。但是,很明显,财产数目和服务频率主要视行情而定^[17]。

这些评论最后以两个结论收尾:

1. 如果家庭保留了许多劳动性功能,那么,履行职责的结果就会和感情结果相矛盾。后者把夫妇双方的感情发展看作第一目标和合法婚姻的中心思想。另外,从空间上讲,谋生活和家庭环境分开了。这使得家庭流动性更大了。各人都可以离开家庭,而不会在无意中失去工作。在农业和手工业体系中,就远不是如此。再说,他们还可以比较(比如家